



中国不高兴

↑ 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 ↓

宋晓军 王小东 黄纪苏 宋强 刘仰 / 著
The Great Time, Grand Vision and Our Challenges
UNHAPPY CHINA

CCTV、凤凰卫视特约军事评论员**宋晓军** 中国民族主义领军人物**王小东**
社会学家**黄纪苏** 《中国可以说不》作者**宋强** 资深媒体人**刘仰**

为国直言 替天行道

国家运程 外交变局 社会迷思

抽丝剥茧驱妖蛾 敢为今世开太平

中国不高兴

↑ 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 ↓

UNHAPPY CHINA

宋晓军

王小东

黄纪苏

宋强

刘仰 /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不高兴/宋晓军等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 - 7 - 214 - 05606 - 1

I. 中… II. 宋… III. 时事评论 - 中国 - 2008 IV. D6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3367 号

书 名 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
著 者 宋晓军 王小东 黄纪苏 宋 强 刘 仰
责任编辑 陈中南
文字编辑 陈尔西 杜牧君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214 - 05606 - 1
定 价 29.8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 CONTENTS ///

1 第一部分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 2 一、必须正视的“内政愤懑” //宋 强//
- 8 二、事情正在起变化:2008 年西方的“天鹅绒”
试探中国的“铁手套” //宋晓军//
- 16 三、缺乏外部选择压,中国不高兴的症结 //王小东//
- 23 四、2008,神鬼莫测 //黄纪苏//
- 32 五、回望 2008:我们不需要短暂的亮光 //刘仰//
- 34 六、该由西方正视中国“不高兴”了 //王小东//
- 39 七、警惕余世存式的知识精英主导一个国家的精神品质 //宋 强//
- 49 八、大目标、现代化与“文艺腔” //宋晓军//
- 53 九、“文艺腔”测不准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 //王小东//
- 59 十、“文艺腔”之后可能就是儿童腔与娘娘腔 //黄纪苏//
- 61 一个国家的欲望与恐惧【附文1】 //张小波//
- 64 疑虑重重的中国准备迎接世界【附文2】 //杰夫·戴尔//
- 67 我们可以帮助中国拥抱未来【附文3】 //托尼·布莱尔//

70 第二部分 中国的主张

- 71 一、英雄国家: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具有的心理指标 //宋晓军//
- 77 二、美国不是纸老虎,是“老黄瓜刷绿漆” //宋晓军//
- 87 三、中国无法不显其大 //宋晓军//
- 89 四、持剑经商: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 //王小东//
- 96 五、解放军要跟着中国核心利益走 //王小东//
- 99 六、金融产业比重过大是腐朽的标志 //王小东//
- 105 七、把住强盛大国的命门 //王小东//
- 112 八、不能任由美国绑架世界 //刘 仰//
- 115 九、打倒拳王,打碎拳坛:建立新秩序从逼迫内部高尚做起 //黄纪苏//
- 120 十、“趁火打劫”:托起我们的技术水平 //王小东//
- 127 十一、我们的拷问:西方为什么不能改变生活方式 //刘 仰//

- 130 十二、走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路 //王小东//
- 134 十三、历史会不幸证明,奥巴马拯救不了美国 //王小东//
- 139 十四、中国对西方:“有条件地决裂” //宋 强//
- 144 十五、不能再搞“轮盘赌”:把中法关系实质性降低 //宋 强//
- 147 十六、萨科齐见达赖:了无新意的游戏 //王小东//
- 149 十七、论“优秀的中国人”:马立诚等人的“勇敢”是在
挑战民族底线 //宋 强//
- 154 十八、爱国,关乎吃饭问题 //宋 强//
- 158 十九、中国可以不说 //宋 强//
- 160 今晚,谁在阅读米奇尼克【附文1】 //张小波 宋 强//
- 163 中国对美国的三个真正挑战【附文2】 //傅立民//
- 167 受害者还是获胜者?【附文3】 //兰·布鲁马//
- 171 中国是一个值得关注但不应恐惧的国家【附文4】 //马尔科姆·里夫金德//
- 173 中国的国际观从何而来【附文5】 //郑永年//
- 176 世界看中国与中国看自己【附文6】 //裴敏欣 戴维·蓝普顿//
- 179 由“挑战者”走向“协调”合作的多元化中国外交视角【附文7】 //天儿慧//

186 第三部分 放下小菩萨塑伟大之目标

- 187 一、时代病相:精英们怎样营造“活地狱” //王小东//
- 193 二、自我矮化的哲学这样大行其道 //宋 强//
- 199 三、自由民主“先贤祠”里的先生们在贩什么私货 //宋 强//
- 206 四、他们永远是精神上的侏儒 //刘 仰//
- 208 五、睁大了眼看未来:复兴传统不能走歧路 //黄纪苏//
- 210 六、大目标从哪里诞生 //黄纪苏//
- 217 七、猥琐心态支配下的文化世相 //王小东//
- 221 八、钱钟书:轻薄浮躁文化氛围里诞生的“泰斗” //黄纪苏//
- 224 九、王朔热:民族精神下行期的典型症候 //黄纪苏//
- 227 十、王小波的“门下走狗”们,应该长进长进了 //黄纪苏//
- 230 十一、王小波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虚伪、最丑陋的神话之一 //王小东//
- 232 十二、一个正常的社会,动物性还是少一点为妙 //刘 仰//
- 236 十三、这个时代的学术腐朽 //黄纪苏//
- 240 十四、切勿去学香港“管家文化” //王小东//
- 243 十五、火烧楼垮,又到了想象未来的时候 //黄纪苏//
- 248 中国前途之辩【附文1】 //李明江 等//
- 258 中国的崛起【附文2】 //唐纳德·斯特拉斯海姆//

第一部分

/// // / /// // ////////////////////////////////// // / DISPLEASED CHINA /// // / /// // ////////////////////////////////// //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内政的愤懑并不可怕，我仍然以乐观主义的态度看待前途，每件事中有盈有亏，有实也有虚。如果我们从盈中看亏、实中探虚，找到一条避虚防亏的路子，即使未如人愿，我们的情绪也不会跌落到谷底。归拢人心就有希望。

2008 年给人的感觉是鬼神莫测，太戏剧性了，让各种预报名誉扫地。社会处于常态的情况下，很多事情是容易预料的。当变量太多，以往经验所提供的套路派不上用场时，也许就说明又到了未定之天。

整个 80 年代“传承”下来的风气就是大家喜欢拿文艺品质自炫炫人，风花雪月，误人误己。

◆ 宋 强

一、必须正视的“内政愤懑”

情感共振点出了问题

2007年冬天，我在北京电视台参加一次研讨会，这时北京市正在酝酿一个大工程，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制作一个大型专题片《北京记忆》。我接了这个活儿，以后的好几个月里大家一起策划，在磕磕碰碰中把这部片子的撰稿完成了。这个专题，说白了，就是关于一个国家和她的首都梦想与实现的“豪情阐述+盛世抒情”——这个东西，不管你怎么去设置一些复调，一些舒缓的、亲民的“夕照街”式唱晚，不管你怎么编排得温馨收敛克制，肯定不能回避那种咋咋呼呼的“平安大道”“鸟巢飞跃”的大风景大挥写。一句话，你要写一部正在实现巨大扩容的时代进程的赞美诗。

那次会上，忘了是哪位说了这样一句话：要认真想一想，30周年的纪念和1998年20周年的纪念应该有什么不同。

参加这个研讨会的有著名的马未都老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颐武教授、《大国崛起》的总编导任学安和《复活的军团》总编导金铁木。会上大家都提了很好的意见，比如讲：反映成就是必须的，但是，能不能层面再丰富一些，不再仅仅把兴奋点着眼在“变化”上面？我们是否还要扣着“变化”来煽情？除了展示“变化”和时空落差、“财富史”的梦想工厂，我们还能不能说点别的？

当场我就觉得这话说得太好了！

30年和20年都搞纪念，但30年比照20年，我们真的要体现出新意。这还真不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需要。20年和30年，从欣然隆庆盛世，到现在的强化

了一些焦灼，多了一些反思，我们应该扪心自问，难道只是跟心绪变化的不同有关系？

我想说的第一个题义：我们的忧虑就在于情感共振点出了问题。像《咱们老百姓今儿真高兴》这类东西臭了大街，策划人和写歌的并不冤。许多策划人就是爱犯这样的毛病，一个点子，也不管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自己在那儿越想越兴奋，“小圈子激动”，合理性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很多失败的策划，就是犯了这个错误，把自己小圈子冲动当成别人也一准儿有的情绪。

那次会上，我也说了这样一些话写30年的历程，政绩肯定是要反映的，“成功学”的魂儿一定要有的，但张扬昂扬情绪和展望未来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不同人的情绪。如果像惯常的思路，一味赞美成功人士，一味不加克制地渲染对资本家的艳羡，按照“财富史”的套路来比之兴之，那我们做出来的片子将是一个有肉没骨的东西。

说得更不好听一点儿，这就是一个势利眼的东西。

当然，一个片子的承载量是有限的，但至少可以稍微有些创意，一窝蜂去踩“悦宾饭店”，去磕“傻子瓜子”，甚至于，还像过去那样，去给可口可乐、肯德基做免费宣传，对开放的理解都浮于这些，那我们未免太菲薄了一点！

物理意义上的扩张和增量，怎么去夸耀都不过分，但是，如果总是摆脱不了这样一个套路，喋喋不休地告诉人民：哪些大工程诞生了，盖了哪些大房子，如果总是跳不出“划时代的”“改写历史”“让我们见证今天”这样的表述，我自己会不会捏着自己的鼻子，暗叹我的俗气？而在很多大型直播当中，你会看到，很多主持人讲出来的（实际上是文案告诉他们的）净是这些把“咋呼”当诗意的东西。一次，两次，你说“我们正在见证历史”“这是改写……的一天”，可以，而且这种表述确实依托了某种时空优势；但是总把这种感觉无休止强化。过了头，就是幻觉，依仗今天的优势对历史卖俏，不地道，卖弄过了，是经不起推敲的。

可惜这个话题没有怎么展开来说，但是却有一种激活的功能，“说点别的……”在我脑子里闪了一下。2008年初，我开始设计这个编年体30年的时候，似有感应，不可遏止地迷恋上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城的时代风景——地震棚，那个时候是知青大返城的年代，北京居民的窘迫家居，居然因为地震的“恩惠”得到“改善”。地震棚，注定不会进入北京民居史的记载。我设计了地震棚作为一个时代缓慢开始的意象。编导照着“地震棚往事”拍着拍着，地就摇了，本来是带着一种“得了便宜卖乖”的心理忆苦思甜，结果“往事”变成了现实……这一段审片的时候给删了，可能他们觉得这种“呼应”写法，不太好把握火候。我在想，大概写文章的人都在一种怪怪的思维上游走，所以当2008年大地震来临时，我宁愿以己推人，认定发表“天谴论”的朱学勤就是文人式的神

叨叨，不晓得如何克制自己的孤愤，以至于走了火，而已。

“国运”这个字眼，我们是不怎么常用的，因为既然说到“运”，就有否和泰的区分。把“运”挂在嘴上，有点唯心，给人一种不吉祥的暗示。国家的走势什么时候也像田园经济那样看天吃饭了？但是你沉下来想一想，说“运”还是有道理的，要不国歌怎么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008年，确实是一个非凡的年代，神奇得让最有想象功夫的人都没有心思另编故事了。比较绕口的说法，这一年想来什么就来什么（别误会，这不单是指人心险恶），反过来，你不想来什么，也有不想来的上来凑趣。按照晚会台词的说法：这一年，崇高的感情和激愤的情绪交织；这一年，愁苦和欢乐同时。在专题片制作的期间，我在电视台的“编导人员公约”上签字，大意是：不得擅自参加灾区报道，不得参加抵制家乐福等等活动或者发表相关言论。以前，在我的写作中，没有一部作品像这个时间传记那样命运多舛，受到形势干扰如此之频繁。其间的情绪起伏，忽嗔忽怒忽悲忽喜，感觉是被剧场里的急峻气氛迫着，写着写着就疑心自己落伍了。

这一年真是光怪陆离，值得我们停下来掂量掂量。

十多年前我们写《中国可以说不》，质问过某些“公共知识分子”（那时候这个词还没有被炮制出来）一个问题：为什么越是国内形势好一点，你们就越要泼冷水啊？什么“投降兴趣”，什么“维持会理论”，什么从春秋战国和克里特文明解读出“分裂比统一好”，还有什么“宁做苟活的亡国奴，不做饿死的中国鬼”。当时看不起这帮臭知识分子：谁把你们家孩子扔井里了，你们那么多的切齿仇怨？都是中国人你装什么孙子？但十年间仔细想想，也心平气和了。愤懑，其实也是一种需求，哪怕你把它贬低为“消费需求”，它也自有其深刻的由来。本土愤懑成气候，情感共振不是那么和谐了，你就要剖析解决，不能老是抱怨有人不图感恩、不知好歹、不识大体。

大概也能感觉到逆反心理的存在，官方社论也说：一个国家的发展，只有从世界和时代的坐标上去认识，才能准确把握；一个社会的变革，只有源于人民群众的共同呼声，才有生机活力。”我对这段话的解读，还是有一些对民心浮躁的吞吞吐吐的抱怨。但这个社论的意思确实不坏，比方说，做一个电视节目，要提高收视率，一定要找到情感共振点，共振点出了问题，你不能上来第一反应就是观众品味低。现在，国家社会的情感共振点确实有问题存在，你不能还是老一套，还拿上世纪80年代的俏皮话“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来嬉皮笑脸回应。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再这么做了。

情感共振点出了问题，就要建立共识，再困难都要努力去建立。国运多艰，切莫失去张致。内政的愤懑并不可怕，我仍然以乐观主义的态度看待前途，每件事中有盈有亏，有实也有虚。如果我们从盈中看亏、实中探虚，找到一条避虚防

亏的路子，即使未如人愿，我们的情绪也不会跌落到谷底。归拢人心就有希望。

还是少一些万金油式的“明白人”为好

我个人的感觉，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纪念，总体不是太高调的，是比较克制的。这就证明现在的领导人沉稳，心中有数。举办奥运会就是一个盛典，就是改革开放成果的现场总结，没有必要一轮一轮“火树银花不夜天”。从宣传策略来说，这里面有一个张弛有度的问题，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你强化了这 30 年，那么 60 年大庆，你又要整出一个什么调子？在 60 年和 30 年的调子里，又要体现什么不同的侧重？并非我不懂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而是担心带着各种特定情绪的人借势上架，形成对撞，大家又来一次吵架。而且现在形势确实有点紊乱，我们近年来感到的困惑是，不论是局部危机还是总体性危机，给人的感觉都是坐等而来的。处理起来急急惶惶，有点捉襟见肘。早些年，北京下雨，水排不出去，哎哟，你看那个乱劲儿哟，城市系统差点瘫了。这一两年问题更多，发生了群体事件，领导批示说“……是第一位的”，三鹿奶粉祸国殃民，又表态“……是第一位的”，什么都是第一位的，什么都成了“重中之重”，一句老话：多中心就等于没中心。不是乱了张致吗？银行先是提高利率，不到两个月马上要刺激，哗哗往下降，这不是看天吃饭吗？听一个老同志说，中央开会的时候，开始的议题和会议结束的决议完全不一样，大呼隆、大拐弯。这些智囊是干什么吃的？连我这种“领导学”“管理学”的外行都看得着急。这不像我做电视那样被牵着鼻子走吗？这是怎么了啊？

说到“中国不高兴”，不能回避的是我们普遍能感到的内政的愤懑，说出这一点来，并没有什么不好。

然而，为什么我要对一切高歌猛进的表演表示低调？是因为我看到大多数的“睿智”表演体现出的情绪和无意中露出的那种狞笑，看不到那种出于真正挚爱我们这个国家，挚爱我们这个民族的本能的质朴情怀，没有因为挚爱而体现出的忧伤。如果说稍微优秀一点的中国人都靠着抖机灵打发日子，所有人表现出来的就是“其实我是明白人”，而做明白人的动机，就是不管将来怎么样，都能站在一个最有利的位置上。大家都去这么自以为是，那么这个国家怎么办？

在一个小范围聚会里，我听到宋晓军讲述他在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所见所闻，他描述的那些默默无闻的人，那些为了我们这个国家不受人欺负而辛勤工作的人，他的描绘，令人想起了一部正在消失的民族传奇——“哈军工”的昨日故事，想到《神火》，想到《暗算》里 701 单位的画面。那些寂寞的英雄，并不拒

斥布尔乔亚的青年男女，他们所肩负的，就是让中国走出“不高兴”的阴霾，他们为此是付出了代价的，但是相信没有一种代价会比起现今当下，范跑跑和《色·戒》所引起的欢呼，会让他们更加痛心。

由此想到的是另一番图景：借民众对内政状况的正当的愤懑，让那些自我作践的民族观、价值观重新抬头的颓废的舞蹈？难道我们真的到了一个可以离地飞升的时代了吗？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风流人物”，像我们这样不知羞耻地玩“超越”，“超越”得一切底线都可以不要，一切可能的认同与共识都可以消解？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智识人士，敢于以霸权大国的“第五纵队”的姿态来狃狃于大庭广众（而且根本不打算掩饰这一点！起码甘愿做第五纵队不以为耻，是一个心理现实？所以，讲到“中国不高兴”的林林总总，必须要道破这一可悲的心理现实。

最近的某一天，听到作家萨苏讲他的父亲——新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专家，正在被癌症折磨的现状（他父亲所在的那个专家组，所有的人因高危工作环境而患上肝癌并先后辞世）。在这里，我引用萨苏献给父亲的一段话：

我们这一代很多人走向天涯，无法再做一个好的儿子或者士儿；……用中国人特有的坚韧和悟性，来完成别人视作畏途的工作，一如世界每个角落我们的同龄人在做的一样；不过为国家的每一点进步而欣喜，为它的每一点痛苦而忧伤，一如每一个眷恋那片土地的人一样。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平实地做人，我们维护自己心中的那一份荣誉。

“为国家的每一点进步而欣喜，为它的每一点痛苦而忧伤，一如每一个眷恋那片土地的人一样。”——在善变者的眼里，这是多么迂腐的感情啊！但是，说出这一点关于“国家认同”的话，就真的那么令人难堪吗？

我有一个70后的朋友，对时局的看法是悲观的，他的历史观点和我大不一样，但他的话充满“一损俱损”的忧虑，和流行的卖弄高超的冷峭形成对比，我觉得他的感受是可贵而孤独的，但未必孤立：

为“反”而“反”一定是不对的，但情况确实是，民众的被剥夺感并非没有来由。官员的傲慢和不敬岗，又加剧了这一矛盾。

也许已经错过了从政府到民间建立基本共识的时机。改革，是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而剧烈的社会震荡，伤害每一个人。怎么办？

“剧烈的社会震荡，伤害每一个人。怎么办？”这里，至少把“建立共识”作为了一种希望，这里没有幸灾乐祸的看热闹，没有“食肉寝皮”的切齿咬啮。

我理解他的愤懑，愤懑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一种普遍的感情。我更看重的是，他这话透露出我们时代稀缺的品质，就是虔诚敦厚，“位卑未敢忘忧国”。

很不幸，忧国忧民现在大概成为所有“明白人”拿来恣意嘲弄的古旧价值了。

也许我的感受又忍不住显出迂阔，不符合现在的趣味。但是偏要迂阔下去，想找到一种丧失已久的崇高感。这就是我经历了 2008 年的悲喜之后说出来的话——

除了叨叨“变化”之外，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不变的东西？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更恒久的价值？

基于这样的拷问，把 2008 年 4 月风起云涌的新爱国主义（青年学生对奥运火炬传递受阻的反弹）纳入到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大历史来看待，我觉得并不高估。这种情绪反应是自发自动的，在这个淡漠政治的时代，表达强大的抗议信息（无论内政外交都是），充满魅力的行动政治，完全应该得到正当的评置（而不应是白岩松们自以为是的抖机灵），完全有理由载入现代中国人精神历史的史册，以及中华民族复兴历史的史册。

这就让我想起曾经做出的某个判断：中国人喜欢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饶舌，但面临重要事实时，他们的态度往往是简洁而深刻的。

“内修人权，外争族权”这句话真的是非常中的。所以老话重提，还是要建立共识。

需要关心的是：这种共识和认同，是否正被不加克制的“本土愤懑”吞噬？我在电视节目研讨会上问过：咱们过去兴盛了多年的“审丑”时髦，是不是该到谷底了？本土愤懑与“审丑”浪潮联结，就像大江健三郎先生说的：制造的是廉价的恐惧和绝望。我们能不能起码从个人励志的角度，去警惕这种心理的瘟疫？

需要追问的是：能否找到一种能维系我们的情感，探寻我们国家和社会中成员之间一种富有意义的关系？

二、事情正在起变化： 2008 年西方的“天鹅绒”试探中国的“铁手套”

“小字辈”不高兴，后果很严重

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原来可能有很多东西比较模糊，用学者的话说就是所谓的结构性矛盾，这一切矛盾在 2008 年逐渐开始清晰了。汶川大地震之前的奥运会火炬海外传递事件，引起了国内外很多阶层的关注。它最不确定的是，没有人想到在 2008 年中国年轻人的表现会如此勇猛果断，具有行动魄力，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能够做出如此迅速的反应。是什么让他们迸发出了瞬间凝聚的力量？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奥运会火炬传递所导致的中国年轻人的反弹，包括抵制家乐福等。应该看到，“火炬一代”的行动不是当年义和团式的，年轻人是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来做出反应的。虽然现在的评估还不可能太精准，但这是西方在改革开放 30 年来第一次看见中国年轻人的反弹。

也许在西方人士看来，一个奥运火炬传递算不了什么，实质上并没有侵占中国太大的利益，因此这种反弹让西方立即表现出了惊讶的姿态。

这次年轻人在各个城市抵制家乐福的一个特点，就是马上付诸行动，立即以行动跟西方对抗，而且目标选得很准。谁搞我厉害我收拾谁。如果没有这次行动，很难说会有中国政府在 2009 年达沃斯论坛上采取的冷落法国的举动。这种以年轻人的反应为主题的具有统计意义的价值选择，对中国外交政策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是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产品呢？我个人理解是这样

的。特别是在最近这20年，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直在为国外打工，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养西方国家过着奢侈的生活，可以说这种物质文化的形成和积累，是中国年轻人在情感上受到羞辱后做出反应的一种条件和催化剂。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给中国上层调整的机会。否则，奥运会很可能会变成一场中国与西方之间“厮杀”的战场，而在这个战场上中国的年轻人的表现，将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更难以抹去的一页。

美国这一次确实是比较蔫，奥运会开幕的2008年8月8日，俄格战争打响了，美国至少在5天内无法判断俄军会不会打到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在奥运会上鸣锣收兵了，没有在奥运会后跟中国过不去。闹得最厉害的是法国，中国年轻人马上以行动抵制了具有商业象征意义的家乐福，非常直接。当时我写了一篇博客，把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的《大众生活》杂志封面贴上去，封面反映的是中国面临全面战争威胁前夕，青年学生最大的一次反弹的情景。

这种看似有些激进的行动，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呢？半年多后，经济危机发生了，中国人辛辛苦苦30年、甚至60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如此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这是不是一种新的“战争威胁”呢？我感觉，这是一种年轻人面对西方可能再次对中国盘剥的预警式的反弹。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火炬事件后的年轻人反弹成为了中国与西方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这件事好像没有1999年中国大使馆被炸时那么激烈，可如果反退到1999年，要是能有2008年这种反弹的能量，那会是一个多么惊人的程度！

从1999年到2008年，这是一个动态的文化变迁过程。这期间有两个军事上的事件：一是1999年的“炸馆”；二是2001年的“南海撞机”。这两件事情当时主流媒体并没有大幅报道，但却成了互联网上年轻人主要讨论的话题。网上的话题，实际上为2008年的反弹完成了一次文化蓄能，只是没有人察觉这种具有统计意义的文化蓄能。因此反弹出来时，中国人没有料到，西方人也没有料到。它的意义并不只是西方欺负了中国，中国年轻人为了了一时的尊严反弹一下，而是从90年代到现在一直积累的东西突然爆发出来了。毫无疑问，那些把“颜色革命”玩得十分熟练的西方人在琢磨这个事，在做大量的统计工作。因为资本主义扩张的矛盾要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产业转移、金融工具和针对后发国家年轻人的“颜色革命”，来维持它的优势。不论是利用中国的市场也好，利用现代化进程的欲望也好，总之，西方需要对中国进行一种符合他们利益最大化的塑造，但是2008年的这个突然爆发，使他们发现，把中国塑造成他们理想中的模式有了一个巨大障碍。这一点随着中国与西方结构性矛盾的显现，就成了非常关键的因素了。

2008 年年轻人的反弹，实际上蕴含了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历代中国人的文化积累。为什么是 1840 年以来的文化积累，积累到了这一代人遇到了这样偶然的事件，迸发出这种剧烈的能量呢？它的统计意义在哪儿？在我看来，它跟 1999 年“炸馆”之后个别大学生上街游行有非常大的区别，它的号召力量、组织力量和响应程度远远超过了：1999 年那一次，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我总感觉这次年轻人反弹的背后，有一种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未来争取的动力，也就是说，他们感觉到了如果再这么对西方软下去，他们自己的未来将被阉割和剥夺，这可以说是他们第一次将个人的未来与国家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的一次迸发。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发现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共生共进，并以一种激烈的方式表达时，这很难说不是一个时代转换的信号。

另外，对于精英层来说有压力的，就是汶川地震后逼着富人捐款的问题。有一些年轻人跟我讲：我把自己工资的 1/3 都捐出来了，我排了两个小时队献血，我就是要他们捐这么多钱，我就认准逼捐是对的。逼“高尚”，有人指责这是“绑架”，就绑架了！怎么着！年轻人说：我高尚，你今天也必须高尚。王石为什么栽了这么一个大跟头，就是对这个东西不敏感、没认识。总的来说，精英受感动了。地震后大家齐心协力，故得不错，领导人表现得更不错。现在的关键是你高尚了，你原来没高尚的账被翻出来了。

这种强压是一种积极现象。

所有成年人都没有想到，原来认为是半吸毒状态沉迷于网络的 80 后忽然高尚了一把。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明星都高尚了。这个年轻人阶层形成的政治压力不能忽视，因为他们的行为体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动向。从文化意义上看，这种“高尚”是从底层年轻人甚至海外、边缘的年轻人开始向上、向中心蔓延的。

地震之后我碰到刘欢，跟他一块聊天，他刚从美国回来为四川地震捐款，但当时中央电视台接受捐款不能划卡，必须是现钞。后来刘欢就急了，都下午 3 点了，还有两个小时，到哪儿弄去啊？没办法，助手说去招商银行，刘欢一起去了。本来一下提 50 万现金确实是违反规定，要预约的，后来招商银行认出了刘欢，又听说急着为地震捐款，银行工作人员立马把 50 万现金给提出来了。后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刘欢一个大口袋，往捐款箱里装。这些微小的细节，虽然是一种小小的高尚，但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文化蔓延的结果。当时有一些明星没捐多，被人骂，要么当时不知道一定要现金，不是太小气，要么就是来不及了。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在年轻人保卫奥运火炬时突发的高尚带动下，形成了一个“场”。很多人投资的是金钱，回报的是与年轻人一起“高尚”了一把。这让人看到了，即便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来自底层的压力还是可以产生“高

尚”压力的。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之前年轻人保卫奥运火炬的高尚行为，后来汶川地震时那种“全民高尚”不会来得那么快、那么猛烈。从军事角度看，这就是一种动员与组织能力。其实西方一直在那儿嚷嚷“中国军事威胁论”，这一次我想他们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威胁。前不久，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来中国访问，去国防大学时，中国军官为他介绍中国军事的基本情况，当时我一个朋友在场，他说，只有当介绍到中国的战时兵员动员能力是1.3亿人时，美国太平洋司令的表情才微微变化了一下，而说到其他东西时，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民间的力量，情绪的燃点，对内政外患都是一种强压。

当然不能说民间高尚整个社会就全部高尚了，反复地这么逼，最后就有可能实现社会总体高尚化，因为外部施加了压力，并且逐渐强大，民间就反弹。最典型的就是抗议火炬传递在法国受阻这件事了。拦火炬这个事，你警察不管巴黎市，那我就堵家乐福，咱不管堵家乐福对还是错，是否符合国家的政策，这确实是最直接的反应，行动主义式的反应，而且外交部发言人也没有说不对。

我们的财富：1840年以来的历史痛苦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产业结构被迫调整，中国与西方的结构性矛盾会越来越多地让年轻人“不高兴”，而这种“不高兴”的催逼，就会产生高尚，高尚的东西多了自然就会寻找大目标。火炬事件最大的标志，就是中国产生大目标的土壤出现了。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在审视自己未来的同时，发现与国家发展的大目标有某种关联时，离大目标的形成就不远了。

冷战之后，西方的扩张模式我们已经很清楚了，用理念传播去颠覆后发国家自然形成的制度，或者用精确打击的方式去摧毁这个制度，进而完成它的扩张模式。当然它的扩张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所谓的后现代的方式。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最关键的就是，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原来是通过一种大规模的战争，来清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也就是过剩的产品和人员，第一次世界大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都是这样。后来，核武器这种无差别杀伤的武器问世，把它原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战争模式给冻结了。

一方面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兴起，西方要调整劳工福利，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博弈；另一方面就是通过颜色革命或者精确打击的方式，去摧毁作为障碍的制度和他们不喜欢的领导集团，去摧毁一种看似抽象的制度化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冷战后体现得特别明显。当然，这背后主要还是粉碎一些国家的工业化成果，美国的方式就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和产业转移。与金融工具和产业转移相配合

的，是对一些国家的捧杀，比如中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美国在经济上捧中国，让你压低加工贸易的劳工工资，向他们供应廉价日用商品，维持他们研发、演练金融工具的经济环境，同时拿着金融工具赚来的钱维持着手中剑的优势，比如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这次金融危机大家看出来了，特别是年轻人，终于发现被人家卖了还替人家数钱的状况，在我们身上残酷地发生了。这可以说是2008年度年轻人不高兴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方这种清除障碍的方式是有先例的，而且在清除别人的时候，我们有些中国人还跟着欢呼。米洛舍维奇也好，萨达姆也好，无论说他是专制也好，独裁也好，都无所谓，它的制度是很完整的，很有秩序的，它自己在运转。西方要么用颜色革命的方式，要么用精确打击的方式，要么两种手段都动用，比较典型的是南联盟，南联盟是通过什么方式呢？是先打后解除。先打，打得差不多，然后一个颜色革命把你甩掉，就是双重使用。1999年的时候美国先用精确打击摧毁南联盟，然后在2000年又玩了一次颜色革命，把米洛舍维奇甩到了海牙法庭，这可以说是最成功的版本。美国没有必要摧毁你太多的工业资源，因为它下一步还要完成产业转移。产业转移之后，那么我下一步怎么玩呢？下一步就是金融工具，通过金融工具来吸取你工业制造业的利润。如果你的制度和领导层还要阻碍我的扩张模式，我就用精确打击或者颜色革命干掉你，然后扶植一个精英层，让你来给我做产业转移的基地，同时给我的金融工具搭建一个吸取利润的阶梯。

这是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玩法，是西方玩的一个非常标准的模式，它的手段就是你阻碍我，我就搞掉你。当然，美国最害怕的还是核武器，为什么他们对伊朗、朝鲜核问题那么重视？如果说当年南联盟有核武器的话，那结果就可能不一样了。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因为印度的恐怖袭击可能闹僵了，这两家都有核武器，特别是巴基斯坦是穆斯林国家唯一拥有核武器的，金融危机在这里会不会成为引发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从中国人的角度去看，西方对付中国，无非就两点：第一就是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迟滞你手中的核武器，防止你跟他拼命；第二就是金融工具，整个操控你。当然，金融工具操控你的前提是你对他开放产业转移的通道。当年我们没有1929年时苏联那样的机会，借助西方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低价买那么多技术、设备，雇佣那么多西方工程技术人员。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只好充当人家产业转移的基地，所谓“用市场换技术”。但是，应该说我们在决定这样做时并没有精打细算，也不可能有设计精细的战略指向：总有一天我要超过你的“大目标”。这一点，无论是德国、日本还是当年的苏联，都做得比我们好。虽然他们在赶超先发工业化国家时，犯了很多的错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后来的后发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就只能给人家当附庸。